

前 言

在跨入 21 世纪的门坎上，人类社会仍然面临着全面重建世界新秩序的问题。新的地缘政治、经济现实正在成为全球和地区发展的催化剂，人类的命运已经不再取决于冷战时期相互对抗的两极势力之间的力量对比。在当今国际政治的多极化体系中出现了一些极具影响力的重心国家：超级大国美国，渴望走向全面发展的欧洲，我们的近邻俄罗斯——他们都在努力构建符合自己利益的亚洲政策，其中首推对日政策和对华政策。

国际政治在 20 世纪末的现实因素是全球化浪潮。因此，独立国家关于建立新秩序的要求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为强烈。一切国家与非国家实体在不同发展程度上都必定与地球上其它某一地区发生的某一事件密切相关。涵盖全球的经济、政治、生态、文化联系把所有国家、组织、企业机构以及独立个体卷入了一个有着复杂相互联系的整体之中。

相互依存越来越成为当今社会一个新的普遍现象。全球化已经向人类昭示了这样一个不容置疑的道理，那就是任何一个国家，不论其在军事、经济领域中如何强大，都无法完全独自解决当今时代存在的各种尖锐问题。要想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加强国际合作，仅靠一己之力，必将一事无成。

在全球化条件下，独立国家的经济、金融问题不仅可以从相邻国家或地区反映出来，而且还会在相关的国际研究机构中产生

更加强大的震荡。今天，遍布世界任何一个角落的金融危机至少清楚地告诉我们以下两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为了克服危机后果，加强国际合作的重要性和重建有效的全球金融新体系的迫切性。

此外，近年来世界各国一直在努力解决的诸如人口过剩、资源枯竭、生态环境恶化等全球性问题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但是，令人遗憾的是，这些问题非但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而且还有恶化蔓延之势。

今天，政治和经济的相互影响比以往任何时期都要大。同时，不断发展的全球化进程也要求进一步密切政治与经济的联系。

在 20 世纪最后十年里，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哈萨克斯坦正在这一变化世界中努力寻找自己的位置。经过几年的独立发展，我们的对外政策已经基本形成，我们国家的国际威信也在日益提高。

本书阐述了在全球化条件下哈萨克斯坦对外政策的形成脉络，分析了 21 世纪到来之前，当今世界的地缘政治格局以及世界主要大国的对外政策，尤其着重论述了影响对外政策形成的重要因素——经济全球化问题，同时指明了哈萨克斯坦对外政策的首要问题。作者深入研究了哈萨克斯坦对外政策的简洁问题，这是由纳扎尔巴耶夫总统在 1998 年 9 月 14 日在哈萨克斯坦外交部工作人员扩大会议上首次提出的。

本书详尽介绍了哈萨克斯坦作为联合国及其它国际组织中的一个全权实体的活动情况，以及哈萨克斯坦与独联体国家进行的多边和双边交往，并从经济角度分析了独联体成员国一体化进程，阐释了哈萨克斯坦与亚洲、欧洲国家的相互关系和对美政策。

本书是在对大量方针政策和事实进行深入分析研究的基础上完成的，其中很多资料为首次披露。

第一章

处于变化世界中的哈萨克斯坦

全球化是世界发展的新阶段和客观过程

人类正在告别 20 世纪，进入新的千年。在现今环境下，国际关系的范围空前扩大，国际关系对具体国家的生活和整个人类发展的影响空前加强。任何一个国家，不论它的实际威望和影响如何，都在参与国际事务。国际社会地缘政治结构正在发生深刻改变，而社会政治体系也与以往大不相同，这使我们有理由认为当今世界的一个历史阶段已经结束，正在进入自身发展的一个全新的时期。这个时期的特点是：经济领域所发生的各种改变已深深触动政治领域、社会领域和精神领域。这一事实最明显的表现和标志就是全球化。俄罗斯政治理论家加吉耶夫认为，就最主要的形式而言，全球化应理解为各种社会关系和制度在时间和空间上以这样的方式扩展和深化：一方面，世界上其它地区发生的事情对人们的日常生活的影响日益增长；另一方面，国家和地区的行为往往可能产生严重的全球性后果。

全球化要求：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其它许多关系与联系具有世界性特征。同时，全球化意味着具体国家内以及各国之间相互协作水平的提高。

经济全球化是新旧世纪交替之际世界发展的不可分割的特征。

经济世界正在全球范围内逐步形成。在这个经济世界中，全球化经济正在成为统治制度。如果说以前世界经济是一块所有主权国家都在其中活动的场地的话，那么现在世界经济正在变成在各个国家范围内活动的独立的主体。而且，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比经济机体的繁殖更多。政府所熟悉的、确定“世界坐标”的投影方法正在发生根本的改变：从军事、政治领域投向政治经济领域。经济开始证明自己不仅是管理的方法，而且是政治，甚至是意识形态。

仅仅是在不久前，在我们的印象中世界经济体系由一些国家的经济组成：即由大国和小国的经济，居主导地位国家和附属地位国家的经济，高度发达和欠发达国家的经济组成。而且完全有理由相信，每一个国家（人民，国家）主要是自主地建设本国经济，掌握自己的未来。目前，在这个意义上，没有一个国家是自给自足的国家，甚至包括美国在内。每个国家的发展状况越来越取决于同其它国家的相互合作，取决于同超越国家的全球化进程的协调一致。而且，这种对国际和超越国家全球化依赖的后果与世界各国发展规划并不十分和谐。在 20 世纪初和中叶，这种发展规划是不可动摇的。

经济全球化作为现代世界发展的一种现象具有包罗万象的特征。今天，经济学的主要注意力集中在下列五个方面：金融全球化；建立跨国公司；经济地区化；世界贸易集约化经营；经济趋同化趋势。

全球化是美国人首先提出的。“全球化”这一术语出自列维特 1983 年发表在《哈佛企业评论》的一篇文章中。他用这个词说明庞大的多国集团生产的产品市场的融合。在哈佛商业学校这一术语被赋予更加广泛的意义。这一术语主要的推广者是这个学校的顾问、于 1990 年出版了名为《没有国境的世界》一书的日本人奥梅。他认为，世界经济今后将由三位一体的三个中心（欧

盟、美国和日本)的相互依存关系决定。他断言,一些国家的经济民族主义已变得毫无意义,“全球公司”在经济舞台正在扮演强者角色。虽然,并不是所有人都同意这一绝对的看法,但是奥梅的观点却成为每次讨论全球化问题时首先要讨论的问题。

全球化是以国家间和跨国形式同时发展的两个进程。因此,全球化的代表者有许多:如国家,国家集团,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虽然“演员”很多,但是还没有多到它们彼此之间按照自由竞争的原则相互协作的程度。协作首先具有寡头垄断的性质。

国际关系学关注的重点是冷战的结束(当时世界被视为东、西方或南、北方两极世界),跨国化的加快和各国相互依存关系的加强,以及在联合国和其它国际组织的帮助下国际新秩序的建立。社会学家正在密切注视着那些能够证明在文化多元化影响下,不同国家和地区人民的生活方式正在接近具体事实。

目前,工程技术人员正在讨论的问题有:技术全球化,或将一些国家发明的新技术和新工艺合并成统一的技术知识综合体;在邮电、运输、生产领域建立“技术宏观系统”;通讯革命的影响;建立互联网和将世界上所有人都变成统一的“地球村”居民(早在1962年加拿大人马克·路安就提出了这一术语)问题。

法国政治研究所教授巴吉撰文说,既然全球化这一术语没有统一的定义,他想从国际关系学的角度对这一概念做一个总体的描述:(1)全球化,这是一个在数百年的时间里发展的历史过程;(2)全球化意味着世界的同化,统一的生活原则,信奉同一种价值观念,遵循统一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标准,追求一切事物普遍化;(3)全球化是日益增长的相互依存的认同,是在世界各种事务新的参与者的影响下,国家主权遭到破坏和损害的主要后果。这些新的参与者是那些彼此之间以及同那些在国际关系中扮演传统角色的国家在平等的基础上相互协作的全球公司、宗教集团、跨国管理机构(网络)。

在谈论全球化问题时，金融全球化问题即使没有占居中心地位，也占居着重要的地位。下列理由有利于对金融市场全球化作出积极的评价：金融市场全球化能够使每一位企业家保护自己免受汇率和利率突然和急剧变化风险的影响，迅速适应诸如石油、金融震荡或两德统一这样的突发事件，以及阻止政府实行通货膨胀政策和增加国家债务的政策，以维护经济行为的基本规范。在全球范围内市场关系居统治地位的情况下，各国将不得不实行比较理智的经济战略。

这样，“国际货币和金融的不稳定性就成为金融全球化的主要特点。”因此，学术界始终在讨论在世界范围内建立新的调节手段的必要性问题。许多西方专家认为，21 世纪的一个主要任务是找到将国家主权的某些内容与金融统一划一兼容并蓄的方法。在这种情况下，对市场进行直接监督时出现的各种困难，将迫使投资者提高其责任感，而不是市场的操作者。

法国研究人员列穆安援引消息说，中国在国际商品贸易中的地位大幅度提高，从 1980 年到 1996 年，中国的出口额增长了 7 倍，即从 180 亿美元增长到 1510 亿美元。这位法国研究人员援引这条消息的主要目的是想说明，一个国家能成为“世界贸易发动机”之一，这不仅取决于国内因素，而且还取决于“外国公司在这个巨大的推动力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特别是，由于有了被称为外国资本和中国贸易“分配站”的香港的参与。外国对中国 50% 的投资和中国 50% 的对外贸易额均通过香港。如果没有世界经济全球化趋势，中国像东南亚其它新兴工业国家一样，未必能够在经济发展中取得如此巨大的飞跃。

全球化不仅表现为在全球范围内商品和金融交易过程的扩大和集约化，而且还表现为从事商品和金融交易代理商的变化。由于资本的集中，这些操作者变得更加强大和庞大。而且，随着商品和金融交易代理商在许多国家不断拓展自己的商业活动，他们

开始重组自己的组织和管理机构。他们仿佛在自己的商业活动范围布下组织和技术的天罗地网：有通讯网，运输网和金融网。与这些公司网络同时存在的还有子公司网络、地区网络、黑手党网络等等。伴随着源源不断的货物和资金，这些网络的跨国性和相互依存的性质不断加强。

全球化正在悄悄地渗入我们的生活，一个最有说服力的例子就是在全球范围内集生产、运输和销售于一体的毒品交易。毒品交易已成为一个不分国别、没有国界的全球性现象。毒品交易依靠毒品的供求关系及倾销和易货法则进行调节。毒品交易使用 20 世纪末任何一个日用商品生产商都使用的战略和策略。与毒品相关的所有事情都同时具有“现代的”和“传统的”，“世界性的”和“局部的”性质。

全球化至少将 7 个新的国际关系主体推上世界舞台。它们的决定和行为正影响世界发展的进程。这 7 个新的国际关系主体是：国际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粮农组织、国际劳工组织、国际旅游组织、俄罗斯加入后变成“八国”组织的七国集团）；地区组织（总共约有 60 个）；多国集团（约 6 万个）；法定的投资机构（退休和投资基金会，保险公司）；非政府组织（“绿色”和平组织、“无国界医生”组织等等）；大型城市（伦敦、纽约、东京、法兰克福、巴黎）；个人（科学家、大学教授、演员、一些诸如索罗斯和比尔·盖茨这样的人物）。它们之中有 4 个主体正在受到严格的审查。它们是：作为全球的主要“演员”的美国、多国集团、大型城市和个人。

由于跨国公司活动和资本运转领域的扩大，国与国之间的经济边界正在受到侵蚀。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其它金融组织和机构正在发挥着作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由当时并不大的 35 个创始国组成的同盟，变成现在实际上已经控制着整个世界

经济的组织。这些组织和机构与各国之间的多种多样的联系正在形成，而且必将进一步扩大。不仅如此，它们正在渗入各国的特权领域。所有这一切促使各个地区的国家之间在生产的组织和生产效益方面的差距不断缩小。

在这种情况下，各国经济彼此相互影响的程度和范围正在不断加强和扩大。而且，这种相互影响在生活的各个领域几乎随处可见。过去，每一个具体国家的传统做法都是由国家制定最好的管理体制，这些国家的经济都遇到过诸如失业、通货膨胀、经济滑坡、技术水平低下和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等问题。今天，这些问题与其说是国家的问题，不如说是世界性的问题。一个国家出现的经济下滑和失业问题常常被“出口”到其它国家。例如，形象地说，当美国经济开始打喷嚏时，世界其它国家的经济也正在患肺炎。或者说，当德国和日本的经济增长速度太慢时，其它发达国家就会请求这两国为了整个世界经济的利益而采取措施，刺激经济增长。一个国家出现的通货膨胀经常会在加剧其它国家的通货膨胀。例如，石油出口国提高石油价格不可避免地会影响世界市场其它商品的价格水平，而工业发达国家工业产品价格的提高又会对发展中国家工农业产品价格水平产生消极影响。纽约和伦敦确定的贴现率会自动决定整个世界的贴现率。一个国家奉行的关税保护主义不可能不影响许多其它国家的贸易。

金融市场以及具体的大金融家或大型组织有能力对一些国家做出的政治决定，甚至这些政治决定本身的性质产生重要影响。美国经济学家斯麦泽尔在评论这种现象时指出，任命某人担任设在法兰克福德国联邦银行总裁一职，与任命某位美国著名人士在美国担任某个高职一样，都同样会引起美国人的关注，因为德国联邦银行已开始对美国经济产生极其深刻的影响。

这同样也适用于其它国家那些拥有雄厚资本的银行。美国观察家柳克对这类和与之相似的事例分析后得出结论认为，随着通

讯中心的普及，居支配地位的金融中心的概念已经变得不合时宜。当然，这种观点不免有过分夸张的成份。但是，东京、香港、新加坡、汉城、伊斯坦布尔、开罗、莫斯科，同那些老的中心——巴黎、伦敦、罗马、柏林、纽约、旧金山和其它城市一样，正在变成支撑世界经济的中心，这是不争的事实。

经济领域发生的一切和与之相关的其它改变和转变，使许多与保障国家安全有关的地缘政治问题正在以新的形式出现。简而言之，如果说以前在国际舞台上，国家常常借助于军队和意识形态权力和影响明争暗斗的话，那么今天这种争斗已经转到利率、汇率、“市场有效率”等其它领域。换句话说，正如美国观察家希尔什在文章中所说那样：“按新的规则玩老游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世界未来的并不是在夜间能够以武力相威胁的军队，而是昼夜 24 小时工作的敏锐的经济学家。他们只要轻轻一按电脑的键盘，就能够攻击脆弱的外汇或给世界金融资本发出撤出这个国家的信号，尽管这个国家已经提高关税。”

换句话说，冷战时期，军事现实决定全球战略，决定经济意图。与冷战时期不同，现在经济现实决定并造就我们的世界。在评论这一现状时，杜兹建议用“世界政治经济”替代“国际经济”这一概念。

在确定一个国家的实力以及这个国家对外政策的轮廓和方向方面，经济因素的作用明显增长。这使得许多研究人员的脑中出现地缘经济这个概念，用以替代或补充地缘政治概念。

军备竞赛的缓和伴随着经济和科学技术领域愈演愈烈的竞争。调整这一竞争的形式不仅对世界经济，而且对国际安全和政治关系更加广泛的领域将产生深远影响。其危险性在于，受到经济状况恶化和社会压力的刺激的带有民族主义倾向的经济政策，可能会将庞大的经济强国推向地缘经济。在地缘经济的情况下，地方主义的经济利益迫使政府在日益相互依存的国际体系中追求

边缘利益。正如中国研究人员何方指出：“争夺经济主导地位的竞争和斗争、控制与反控制、制裁与反制裁、庇护与反庇护已经成为国际斗争的主要形式。”因此，他断言，由于竞争的扩大，“地区强国将让位于贸易强国”。这种变化的实质是，各国都在从各国间以扩大本国领土为目的的“强者游戏”向“追求富裕”的游戏过渡，这种游戏的目的是经济增长。

专家认为，未来的 21 世纪将以建立全新的大型跨国康采恩、超越国家机构和组织为标志。全球化正在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趋势，因为全球范围的劳动分配已经证明自己的效益。

全球化进程的迅猛发展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因为，现代信息技术和通讯手段取得了革命性进步，与此同时伴随着资本、商品和人员的自由流动。其范围如此之大，以至于给人们留下这样的印象：仿佛整个地球正在变成“地球村”。但是，在这个“小村庄”里并不存在悠闲的田园生活，因为只有能成为“世界级选手”的那些经济和政治组织才有机会生存下来。

高速发展的全球化所带来的冲击正在形成令人难以置信的局面。世界贸易交换已连续多年超过世界商品生产。1997 年，世界各国国内总产值总和增长 3%。这是十分可观的增长额，它超过 90 年代任何一个相关的指标。但是，1997 年世界商品出口增长了 9.5%，是同期生产增长速度的 3 倍多。

国际劳务贸易的增长更加迅速。但是，直到最近为止，劳务贸易常常不能跨越国家范围。而这也是一种新现象。从 1980 年到 1997 年，广义的商业服务贸易增长速度是商品贸易增长速度的三倍，每年达 9%。1995 年商业服务贸易额几乎占世界贸易总额的 25%。

在国外，比如说在美国或日本，当你看到商店的货架上充满从东南亚或拉丁美洲进口的商品时，你也许会感到十分吃惊。通常，很难买到美国或日本本国生产的摄像机或录音机。它们的名

称就是公司的名称,有着良好的信誉。如“索尼”、“松下”、“宾得”、“柯达”,而它们的产地是新加坡、泰国、韩国,而现在产地是中国的产品也十分常见。“商品在哪里生产的并不重要”,——售货员急忙解释说,——“公司对产品质量负责”。这也是全球化的标志:哪里的劳动力便宜,就在哪里组织生产。

国界不再阻止贸易。越来越多的企业不再仅仅囿于在国内发展。近 10 年来,对国外的直接投资额增长幅度超过世界贸易额增长的 2 倍。由于上述原因,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再指望它永远拥有一定的资本储备或生产基地,例如,当时纺织工业企业离开西欧,选择经济正处于上升时期的被称为亚洲“虎”的国家安家。最近,纺织工业企业又在迁移,因为这些国家劳动力价格提高了。

假如没有通讯费用的降低,那么也就不可能有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发展。因此,现在不用花太多的费用,你实际上就可以同全世界进行交流,而且是实时交流。这已经成为可能。全球化的原理中,没有比互联网更加明确和易懂的。

在 1998 年举行的每年一次的蒙特利尔世界经济全球化国际会议上,加拿大新民主党领导人阿列克萨·玛克多奥在阐述她认为重新出现的世界威胁时说:“在共产主义衰落 10 年之后的今天,工业经济所取得的成果仅仅是保障资本的安全。我们正在遇到毫无约束的资本主义成为我们这个世纪主导经济形式局面,我们正在遇到蓄意使数百万人丧失劳动能力的政策。全球化只注重获得利润,这是自寻绝路的表现。极端不公正是全球化现有模式的特点,它破坏了政治价值观念,也破坏了整个世界的社会平衡。”

富有的工业发达国家是全球化最大的获益者。正是这些国家专门生产高技术产品,而劳动消耗大和使用标准化技术工序的商品的生产都落到劳动力便宜的发展中国家肩上。其结果是,这些

商品在世界市场的比价降低。这对进口这些商品的发达国家有利，因为对他们来说，所谓贸易条件将得到改善（出口与进口价格间的比值）

来自巴伐利亚研究所霍尔曼·比尔托尔德指出：“飞速发展的亚洲国家”和“东欧前共产主义国家”越来越深地融入到全球化进程之中。他强调指出：“在对劳动力技术水平要求并不太高的日用工业品生产领域，新的世界经济的参加者拥有一定的优势。与此不同，西半球传统工业发达国家作为实力强大的一方，它们有能力推出最新的产品，而组织生产这种产品需要技术熟练的劳动力。这样，就同时存在两种状况：这里是普通劳动，而那里是技术最熟练的人力资源，它决定在世界市场上新老‘选手’间贸易流的流向。”

其它方面的重要问题不容忽视。全球化空前拉大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收入上的差距。仅以工资为例。1995年在加工工业领域，德国每小时的工资为32美元，日本为24美元，美国为17美元，英国为14美元。在这种情况下，一则报道令人感到难堪：1998年5月，雅加达港6000名码头工人举行罢工，支持将每天的工资从50美分提高到1美元的要求。另外一组统计数字表明：由于经济危机，印度尼西亚人均年收入降低到300美元。而德国的工人不到10个小时就能挣到这些钱。

英国《金融时报》认为：“每当西方经济出现繁荣的时候，世界经济正好处于衰弱之中。这种反差令人吃惊，甚至是从无先例的。西方国家与世界其它国家之间的差距已演变成难以逾越的鸿沟。”《金融时报》是工商界的机关报，它对欧洲国家与美国之间的差距不断拉大深表担忧，美国隔着大洋正高傲地、不屑一顾地看着世界其它国家。《金融时报》不无讽刺地写道：“在许多美国人的想象中，美国不仅能够保持自己的繁荣长盛不衰，而且，美国还是唯一真正的发展模式，是经济唯一的光明之源。”

这一评论一点也不夸张。让我们看看欧亚基金会总裁查尔斯威廉。梅松在美国一份颇有影响的杂志《外交政策》上是怎么说的：“美国人在自己的公开演说中已经达到这种程度，以至于在美国共和党与民主党两党中几乎找不到一位著名活动家在就对外政策问题发言时，他不是不厌其烦地反复强调，美国是一个不可替代的国家，是唯一的超级大国，是绝无仅有的负责任的国家或世界上唯一有良知的国家。”

亚洲国家对“美国友善的全球霸权”（美国保守的周刊《旗帜周刊》编辑罗伯特·卡甘语）表示极大的怀疑。在亚洲国家爆发危机，本国货币“着魔”般地贬值，失业人口和通货膨胀率增长，生产规模缩小，大量私人公司完全倒闭之后，亚洲国家的反美情绪明显加强。从 1997 年 6 月起，在印度尼西亚，证券市场美元交易额减少 89%，韩国减少 75%，马亚西来减少 73%，泰国减少 57%，香港（地区）减少 47%。英国《金融时报》评论说：“这是不正常的下降，这是惊慌失措的表现。与此同时，美国和西欧证券市场却蓬勃发展，而且同亚洲国家相比，这些国家的有价证券的市行成倍地增长。”

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认为，许多世界领袖和经济学家对各国经济相互依存不断加强的政治后果估计不足。现在不得不为此付出代价。他强调指出：“全球化所表现的不是反映客观现实的现象，而是凶恶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数百万人正在忍受痛苦，资金储蓄一扫而空，几十年来付出高昂代价在反贫困斗争取得的进步受到致命的威胁。”

即将过去的 20 世纪的最后 10 年，各国经济的开放性迅速加强。20 年中，世界性生产中世界性商品出口份额（即所谓出口配额）从 10% 增长到 20%。1/7 的股票交易商同外国伙伴有业务往来。跨国公司国外分公司的销售额大大超过世界商品出口额。所有这些都充分证明，在全球化过程中，各国的商品、劳务、资

本市场的相互依存关系不断加强，与此同时，投资、生产和消费的扩张在全球范围内愈演愈烈。

这在还不具备开放市场和无情竞争条件的世界经济外围地区引起恐慌。那里不断发出反对国际经济关系全球化的呼声。主要理由是：商品和劳务贸易自由化、资本输出商担保的提高和保护知识产权只会对少数富裕国家有利，并导致北南之间经济和社会差距进一步拉大，导致大多数国家处于边缘状态和国际社会两极分化。

以言语尖刻而闻名的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甚至表示，全球化就是将半个世纪前获得自由的那些地区重新变成殖民地。他说，除了痛恨之外，贫穷的人民没有其它方法反对这种丑恶的东西。但是，一旦人民知道全球化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时，他们就会发动自己的“游击战争”。即使是那些颇有名望的作家们都这样评论世界的两极分化。

据联合国一份报告说，从1980年到1993年，大约有15个国家的经济大幅度增长，使15亿人的生活水平得到提高。与此同时，100多个国家的收入出现停滞或下降，那里有16亿人口。而且，其中70个国家的人均收入低于1980年时的收入水平；43个国家的收入水平低于1970年的收入水平。因此，报告得出结论认为：“最近15年中，世界经济两极分化更加严重，不论是国与国之间，还是在世界各国的内部都是如此。如果这样继续发展下去的话，那么工业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上的不平等现象将会从公正变成毫无人性。”

在发展中国家生活着占地球上80%的人口，而且目前94%的新增长人口也在这些国家。当世界上一贫如洗、忍饥挨饿的大多数人满怀与日俱增的绝望和愤怒看到不足世界人口20%的少数人如何在豪华的住宅游泳时，还有什么必要谈论全球化究竟是否道德呢？这的确令人吃惊，但这是事实：随着经济的发展和进

一步复杂，随着全球化进一步加深，北南之间差距，即富裕与贫穷之间原有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进一步加大了。在世界的某些地区甚至出现社会急剧衰落，生活条件绝对恶化的现象。当社会两极朝着两个完全相反的方向发展时，这种情况就出现了。

不加控制的全球化可能演变成与其说是整个人类的幸福，不如说是人类大多数人的贫困。下面是 1995 年在哥本哈根举行的国际会议和 1996 年在罗马举行的国际粮食会议上谈到全球化问题时所列举的一些材料。到 90 年代初，地球上最贫困阶层收入在世界收入所占的比例下降到 1.4%。富人与穷人收入水平之比从 1960 年 13:1 到 90 年代的 60:1。世界上 20% 的人口拥有世界上 85% 的财富和资源，与此同时，有 13 亿人口的生活处于绝对贫困之中。

据世界银行统计，如果这种状况继续下去的话，到本世纪末贫困人口可能再增长 2 亿。世界上有 1.2 亿以上的人口失业，约 7 亿人为部分就业人口。10 亿文盲。世界上近 33% 的人至今还没用上电。大约有 15 亿人不能喝到安全的饮用水，20 亿人栖身在对健康有害的环境中。8.4 亿人处于挨饿或营养不良的状态，其中 2 亿是儿童。在贫穷国家，每年有 1400 万儿童死于现代医学完全有能力治愈的疾病，50 万妇女由于缺乏必要的医疗在分娩时死亡。在第三世界国家 50% 的儿童死亡原因是由营养不良造成的。

同等基础上的全球化触动所有国家的利益。不论是大国还是小国，强国还是弱国，也不管这个国家位于地球的哪个部分。全球化问题在新世纪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占有突出的地位。例如，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指出：“全球化是经济、技术、文化和政治一体化加速发展的进程。它意味着，我国受到发生在国外的各种事件的影响越来越大。那些未得到公认的国家 and 种族冲突威胁着世界许多重要地区的稳定 and 经济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恐怖主

义、毒品扩散和有组织犯罪——这些都是超越了国界的世界性问题。其它一些以前感觉好像离我们很远的问题，今天正严重地影响美国的安全。这些问题包括：自然资源的匮乏；人口的迅速增长；环境恶化造成的损失；新型传染病和毫无控制的移民潮。如果外国市场崩溃或把我们从外国市场排挤出来，我们的工人和企业家就会蒙受损失；如果我们不能迫使其它国家遵守同样的环境保护标准，即使环境保护领域最高的国内标准也不能保护我们自己。简而言之，我国公民确实关心其它国家的繁荣和稳定，关心其它国家是否遵守国际准则和保护人权，关心这些国家是否有能力打击国际犯罪和这些国家的市场是否开放，以及它们保护环境所做的努力是否有效。”

“同时，我们的时代是充满许多大好机遇的时代。全球化使各大洲人们建立起密切的关系，使他们有可能毫无阻碍地交流思想、交换商品和信息。世界上许多国家赞同美国关于代表制董事会、自由市场经济、尊重人的基本权利和法律至上的主要的价值观念，这为和平与福祉，以及进一步密切各国间的合作开辟了新的前景。我国以前的对手现在正与我们合作。经济全球化必将促进贸易、文化和联系的变革，为数百万美国人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和经济资源。”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是较之其它国家更能从全球化中获利的美国也开始感觉到全球化给自己带来的不良后果。由于亚洲“虎”汇率下跌，美国购买这些国家商品的支出减少，但是出口到这些国家的美国商品的价格却提高了。结果，美国进口增长，出口下降，贸易逆差达到创纪录的水平。据美国世界经济研究所的莫里斯·赫尔斯捷因估计，美国的贸易逆差从 1997 年的 1800 亿美元增长到 1998 年的 3000 亿美元。

美国受到巨大灾难的潜在威胁。但是，正如克林顿政府前劳动部长罗伯特·里奇指出，美国那些“在近几年中直接或大量拥

有全球化新经济财富的人的意见目前暂时占上风。他们占美国人口的 15% - 25%。他们之中的一些人频繁出去旅行，说着外语（或者至少能给自己雇一名翻译），他们在纽约、罗马和东京都同样感觉到舒适方便。他们的儿子或女儿中几乎没有人在美军服役。他们成为大多数不得不为其国家霸权主义政策而卖命的美国人的对立面。”

在华盛顿政界经常把经济全球化解释为“美国全球霸权政策”。罗伯特·卡甘在自己的《旗帜周刊》中呼吁将美国的全部力量用于遏制“反对美国的、好战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在北非和中东的兴起，遏制用新武器装备起来的、处于混乱的欧洲的德国和复兴的俄罗斯的兴起，遏制与中国争夺地区领导权的、用新武器装备起来的日本的兴起。”同时，他特别强调：“我们不仅反对俄罗斯，如果它成为美国利益的敌人的话，而且我们将尽力阻止俄罗斯民族和国家的复兴。”卡甘断言，所有这些任务“要求美国在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空前的范围内全面干涉其它国家的国际事务”。

当然，可以对这类主张和要求不屑一顾，大洋的两岸都有极端主义者。但是，他们在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里公开地声色俱厉地叫嚣，这的确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据统计，从 1993 年起，美国对拥有世界人口 40% 的 85 个国家实行了单方面经济制裁或以立法的形式相威胁。

但是，据哈佛大学霍夫曼教授认为，美国在全球化进程中的主导地位不能被视为可以像帝国主义那样将自己的意识强加给参与全球化进程的所有其它国家。冷战结束后，美国社会舆论对本国参与对其它国家的制裁持否定态度。因此，“当美国官方人员能够开诚布公地表达自己的观点时，他们就会说，在没有共同敌人的情况下保留北约的主要目的只不过是因为，欧洲人缺乏办事能力，他们孤陋寡闻，软弱无力。如果留下他们自己的话，他们